

中原时评

■ 个论

“最牛车补”反衬国企车改应提速

深圳国企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最近实行的车改方案:总经理每月6800元,副总经理每月4800元,部门正职与副职每月补贴分别为3600元、3200元。有员工发帖说,已经远远超出7月出台公布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补贴标准,堪称“最牛车补”。对此,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有关人员回应,此次车改标准执行的系2003年深圳市国资办下发的《深圳市市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改革指导意见》,并未超标。(10月16日《南方都市报》)

按照10月14日《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改革大幕即将拉开。”那边“大幕即将拉开”,这边“最牛车补”横空出世,这样的怪现状着实让人看不懂。不错,从报道中可知,按照今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如何推动、何时推动车改并没有明确说法。按照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的公车改革,

要专门制订方案,适时推出,限时完成。”

以此而言,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的车改方案,参照的标准系《深圳市市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改革指导意见》等,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正如多次参与公车改革调研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所说,方案规定的车补标准(司局级每月补贴1300元、处级800元、科级及以下500元)总体看还是比较合适的,“制定这个金额标准都是通过反复调研、测算才确定的。”(见10月14日《中国经济周刊》)所以最简单的逻辑还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改革都能严格按照车补标准进行,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动辄还拿“最牛车补”,怎么还好意思呢?

凡事一旦触动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讲“好不好”到最后注定会搞得大家都没有意思。所以“最牛车补”一事的最大价值,无疑还是其对国企车改提速的提醒。既然公车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均已明确,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的公车改革“专门制订方案,适时推出,限时完成”,完全应该快马加鞭、尽早落地,而不能一拖再拖、延误

时机。原因很简单,国企等公共部门的“公共”属性,决定了这些部门不能是车改的法外之地。而类似“最牛车补”的一再出现,无形中是对车改的“污名化”,在示范效应之下影响到政府机关常态推进的车改,也未可知。

按照车改专家、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说法:“国有企业的车补可以略高于政府机关,但是也要有限度。”以此而言,针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专门制订的车改方案,可以放宽方案规定的车补标准的浮动幅度(方案规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边远地区补贴标准不得高于中央和国家机关标准的150%,一般地区不高于130%,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不同地区补贴标准差距不得超过20%),但善意的提醒是,绝不能给予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缺乏制度层面细化、严苛的标准,类似“最牛车补”疯狂跑偏的事发生的还少吗?所以,我们期待着国企车改的提速,更期待着专门制订的车改方案能够同样细致与严谨。如此,大而言之公车改革,才敢言到边到角、实现了全覆盖。

□晚报评论员 李记

■ 个论

中产者占全球三成咋让人高兴不起来

瑞士信贷银行14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财富过去一年中增加8.3%,达到创纪录的263万亿美元,但是贫富差距在加大,1%的人拥有近50%的财富。其中中国内地占8%位居全球第四。按照报告的定义,财富为1万~10万美元属于中产阶层,全球共有10亿人。其中中国内地资产为1万~10万美元的中产阶层比2000年翻了一番,占全球财富的三分之一。(10月16日《新京报》)

中产阶层越多,就意味着更多人的生活越富裕,社会也就越稳定。因此,中国内地中产阶层占全球三成,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们并不能仅仅停留在数字统计的表面上,更应该看到三成这个统计数字掩盖着的实质问题。细细思量,其实这个“中产阶层占全球三成”的消息,让人根本高兴不起来。

首先,这个三成的中产阶层比例是建立在庞大人口基数基础之上。基数大,人口数量多,无论是贫困人口、中产阶层抑或是顶尖富豪阶层,其相应的绝对数量就多,在全球所占的比例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庞大的人口基数成就了占全球中产阶层的较大比重。更为重要的是,同样是三成,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内地和人口仅为1.26亿的日本,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以及其所体现出的国民收入分配及国民生活水平,就大不同,更没有什么可比性。

其次,这个三成的中产阶层比例是建立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基础之上。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474。而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就表示收入差距处于较大水平,越过了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前几天,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数字显示,按照国际的标准计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约还有2亿,仅仅是贫困人口比日本整个国家的人口还要多。如此看来,我们还能因为这个三成比例而沾沾自喜甚至欣喜若狂吗?

再次,这个三成的中产阶层比例是建立在“高储蓄率”基础之上。瑞士银行的这份报告也指出,相比其他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家庭资产以金融资产比例较高,占49%,原因是储蓄率高。为什么储蓄率高?因

为老百姓不敢花钱,不舍得消费。为什么不敢花钱不舍得消费?因为需要买房、看病、给孩子交学费等。而反观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公共产品和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比例较高,社会福利和公共福祉水平较高,人们并不存在诸如医疗、上学和养老等后顾之忧,并没有因为买一套房就沦为房奴,得一场病就全家遭殃的现实窘境。他们的中产,才是真正的中产、敢于花钱的中产,是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中产,而不是因为不敢花钱、舍不得花钱硬生生节省出来的“守财奴”式的伪中产、假中产。

中产阶层并不仅仅在于财富的多寡,更多的是国民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与生活方式。最近几年无数的国民通过集辛酸和恶趣于一体的“屌丝”一词自称,除了无奈与自嘲的个中意味,更是一种身份认同的集体无意识。这说明对于大多数国民来说,从屌丝到中产的路还有很远。因此,对于中国中产阶层占全球三成这样的好消息,一笑了之也罢,千万别沾沾自喜,信以为真。 □石敬涛

■ 街谈

划清人肉搜索的公私边界 更利公民监督

10月9日,最高法院出台规定,明确约束利用网络公开他人隐私信息,包括利用互联网进行“人肉”搜索曝光等行为。专家表示,这是司法解释第一次将个人信息上升为人格权进行保护,但为反腐利用人肉搜索公布信息可以免责。(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4版)

此次,网络侵权司法解释明确了人肉搜索贪腐可免责,事实上划清了人肉搜索的公私边界,给热衷网络舆论监督的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私域要保护,但必须注重这种保护不影响民众对公共利益的正当监督。换言之,由于人肉搜索的复杂双面性,一味禁止使用这种手段,虽然可以保护公民权益,但同时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舆论监督手段,对反腐机制建设而言,这种顾此失彼的局面,显然并非治本工作所需。

因此,在人肉搜索的正面与反面之间,需要把握好一个平衡点。而人肉搜索反映官员贪腐恰是这个平衡点的反映。因为官员所负有的公共义务,其行为规范已不仅仅是个人范畴,而是一个公共概念。放置于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中予以检验,也是相关方面一贯所倡导的行动哲学。有论者认为,以人肉搜索的方式反映官员贪腐好像有违法治,事实上这是一个误区。人肉搜索反映官员贪腐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举报。既然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富有监督的权利,那么又何必在乎

■ 街谈

五星酒店变无星 寄生性商业出路何在?

严控会议费支出是反腐重要议题,地方政府在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大多做出了“限星”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更是明确规定,“二、三、四类会议应当在四星级以下(含四星)定点饭店召开。”由此产生的一个怪现象是,在全国多地,部分五星酒店放弃星级资质的复审,从“五星”变“无星”。今年以来我国“弃星”的10家五星酒店中,至少半数数为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10月16日《新京报》)

公务会议经费收紧,一些酒店竟不惜主动“弃星”。这样的前因后果,不免令人唏嘘不已。经由此事,公众更加意识到,三公消费与酒店业捆绑之深,以及酒店行业自身的泡沫之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政务会议、政府接待等,已成不少高端饭店的营收支柱。这种略显单一的生存模式,注定蕴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随着各地“限星”政策落地,五星酒店大头的顾客群体面临流失。就此而言,其主动放弃星级,实是迎合政策、保住客源之无奈之举。

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即便是五星酒店,也仍旧维持高价不变。这或许说明,政府系统的戒奢侈俭浪潮,并未能充分抑制需求,从而降低市场价格。更多的时候,那些条条框框的“规定”,被利益同谋者的投机取巧以及市场层面的技术化变通,加以消解。

这种形式是网上还是网下?

厘清这个道理,便能理解网络侵权司法解释划清人肉搜索的公私边界其意义所在。过去,人肉搜索举报了陕西的“表哥”——杨德才,举报了一系列的贪腐官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极端的侵害公民权益的案例,2006年的“虐猫”事件,2007年底“北京女白领死亡博客”,以及今年9月8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汕尾一家服装店主蔡晓青将顾客视频截图发上微博求人肉搜索,2天后该顾客不堪压力跳河自杀。这一系列的事件,其中有的虽然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毕竟被伤害以及因此逝去的生命已难以挽回。

影片《搜索》曾全面揭示了人肉搜索爆发的全过程,综合近年来的相关案例,我们也可以得知人肉搜索之所以泛滥甚至侵犯私人领域正是因为此前的法律针对人肉搜索缺乏准确定义,在一种从众性的“公义”要求下,避免人肉搜索误伤他人也只能寄希望于结果的正义以及大众的自我克制精神。所以,针对人肉搜索这一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信息搜索手段,明确反映贪腐可免责,利于把侵犯私权与监督公权的行为相区分,起到保护公民监督积极性,给予侵犯私权的行为某种必要警示的作用,更利于引导人肉搜索发挥其所应有的正面效应。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比如,通过变五星和无星,供需双方巧妙绕过了相关管理办法中的“限星”条款。这之后,一切依然如故。

公务消费的简朴化、规范化,终究要以健全的财务体系兜底,这有赖于一整套完善的预决算制度、报账制度以及会计制度等。那种变五星为无星,然后“定点接待”依旧的做法,无疑印证了现有的财务约束框架弹性太大,乃至仍给了适用对象极大的回旋空间。

当然,剖析高端酒店的弃星现象,令人忧虑之处绝不仅于此。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过去一贯旺盛的三公消费,塑造了一种专供式、定制型且充斥泡沫的市场状态。时至今日,其又必将反过来阻碍三公消费从高端市场的“离场而去”。须知,不少地方的五星酒店,并非是发端于正常市场、基于民间需求的产物。其自诞生之初,就有着讨好性色彩。这种寄生性的生意形态,存在高度依赖性,且抗风险能力孱弱。

公务消费退潮,那些附着其上的商业业态,又该何去何从?五星酒店变无星酒店案例表明,那些感到威胁的经营者,并无意调整思路、重新定位,而更倾向于随机应变,来继续维系那种寄生关系。就此而言,如何倒逼它们放弃幻想、寻求出路,继而切断这之间的供求同盟,亦是职能部门必须正视的命题。 □然玉